

邓演達的道路

# 鄧演達的道路



鄧演達先生五十年紀念會印

— 1940 —

RW11/2497/09

# 目錄

鄧演達道路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鄧演達的基本精神

鄧演達先生傳畧

鄧演達先生的生活

我們的政治主張

臨時行動綱領

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

抗戰結束後對時局宣言

本黨概述

中國第三黨文獻選輯

章伯鈞

彭澤民

# 鄧演達道路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章伯鈞

(一)

鄧先生殉難十五週年了！

十五年前鄧先生爲中國人民殫苦奮鬥，終於身殉的道路，明確地在我們眼前展示着：

鄧先生說：「中國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叫中國永遠受帝國主義的支配，或者是由中國大多數平民群眾自己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統治，建立平民政權，進行經濟解放，所以：

鄧演達道路是「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的道路。

是由孫中山先生時代資產階級爲中心的民主聯合，發展到鄧演達以農工爲中心的民主聯合道路。

是中國人民解除資本國佔和地主制削，由平等機會發展產業，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

在北伐時代，鄧先生即在實際戰鬥中，領導這個反帝反封建的農工平民聯合的道路發展，當時由堅決執行三大政策而擴大了農工路線力量，作爲武漢革命政府的基礎，一面進行推翻軍閥，反抗帝國主義，一面着手於解決土地問題，雖然內部包含不少反動勢力而致失敗，但農工平民民主聯合道路，已由此向前展開。

十餘年來歷史已證明鄧演達道路是正確的，而且經過革命的戰友和全國人民的苦鬥，民主力量已向這條道路大大地推進而接近於成功的階段，同時亦爲鄧先生指出的「兩條道路」最尖銳鬥爭的階段。

鄧演達道路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一)

## 鄧演達道路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 (二)

目前兩條道路——獨資殖民地，或建立平民政權，以求獨立解放的——的鬥爭，的確是非常緊張，民族危機並不因抗日抗戰勝利而有所改變，而且更加深刻，因為內部的官僚獨裁政治與獨佔資本，更加與外來的帝國主義政策相結合，對中國人民的生活及生存所必須的自由條件，更加殘酷的摧殘，使中國陷於分裂內戰的大災禍中，一年以來各黨派與社會賢達為此會不斷的奔走呼號協商調停，然而結果不惟未能扭轉局勢，而且內戰擴大，這樣的國民黨對於「政協決議」竟置之不顧，單獨召開「國大」，因此今天局勢實為十五年來未有的嚴重，但是我們並不因局面的惡劣而失望悲觀，我們堅信鄧演達道路和全國人民要求的「和平民主獨立解放」的道路，必然勝利，而且將要勝利，我們願獻出最大的努力以擁護「政協決議」並求其實行從實現「政協決議」的聯合政府，而達到民主的平民政權第一步工作，召集不為官僚所包辦，由人民直接選舉代表的「國大」，這是鄧演達道路上我們當前的任務。

我們在時局嚴重中更追念鄧先生的偉大卓越，鄧先生每當反動勢力的威脅到來時，必以最堅強最勇的號召團結人民領導人民向前奮鬥，鄧先生就在為中國革命實踐中開闢了「中國農工中心的民主聯合道路」。「聯消官專政治，廢除專制，樹立民主廣深政府，解決全國人民要求，實現永久和平統一」的道路。今天唯有發揚鄧先生的精神氣魄，走鄧演達道路，繼續奮鬥，首先完成當前的任務。以求中國民主問題的解決。

(一)



793002

# 鄧演達先生的基本精神

彭澤民

## ——爲鄧演達先生殉難十五週年紀念而作——

鄧演達先生在北伐革命的大時代中，領導廣大的農工平民大眾，以狂飈突進之勢，掀起了空前的革命高潮；這是中國人民最光輝的一頁歷史，而鄧先生的精神在這頁歷史上又是光芒萬丈的。時勢創造英雄，有那麼一個奔騰澎湃的革命時代，才能產生大智大勇如鄧先生的革命導師；而英雄也創造時勢，有了鄧先生及其堅苦卓絕的戰友們，才能創造出這麼壯烈偉大的革命形勢。雖然北伐革命的成果爲反動集團佔有和腐蝕了，雖然革命的導師鄧先生爲反動集團殺害了，但那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人物，還留著如何豐富和寶貴的教訓，足以激勵和啓迪我們啊！

今天臨到鄧先生殉難十五週年紀念的日子，我們依然是悲憤無限的。我們只有從鄧先生天才的預見，正確的理論，勇敢的行動，豐富的實踐與整個鄧演達道路中，發掘和找尋出鄧先生的基本精神所在，才能繼承鄧先生的精神方法和道路去完成鄧先生的遺志，去完成中國人民的革命大業的。

鄧演達先生的基本精神是農工平民民主主義。

(一)農工平民民主主義，是透澈了解中國社會性質和特質的產物，也是推動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方針和方法。

鄧先生以爲「整個中國社會，還停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同時又爲帝國主義支配着」。所以中國革命還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他一面指出中國社會革命的條件還未具備，一方面指出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走歐美式的資本主義民主道路；而必須根據中國特殊的具體的情況走農工平民民主主義的道路。這聲

鄧演達先生的基本精神

(三)

鄧演達先生的基本精神

(四)

道路就是使中國解除封建的壓迫和民族的壓迫，「以工農為中心的平民群眾能獲取政權，立即運用國家力量，進行國營及公營的大規模產業建設，防止私人資本的壟斷，發展生產，為產業社會化的基礎，向著社會主義前進。」

鄧先生的農工平民民主主義，就是反帝反封建的農工平民民主政權的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前途。

(二)農工平民民主主義，是正確估計了中國各階級力量關係與革命動力以後的產物，也是運用和組織革命力量的方針和方法。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是暗昧的，行動是妥協的，他們一方面不能澈底的掃除封建勢力，他方面不能堅決反對國際資本的壓迫」。資產階級的模棱性與妥協性，使他不能成為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堅力量。因而鄧先生認為農工的力量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農工階級在數量上佔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受着嚴重的壓迫，在經濟上受着殘酷的剝削，十二分的需要革命鬥爭。」這就是說，農工階級是中國民主革命中最廣大和最堅強的一種動力，所以他做成平民民主革命中心；即是以資本主義時代最先進的工人階級革命意識與中國最大多數最受壓迫的農民群眾的革命要求結合起來，做成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但同時，鄧先生沒有忽視廣泛的中國平民，也是民主革命中的一部份力量，所謂平民，就是指大地主，大買辦，官僚等少數特權階級以外的其他階層，顯然是包含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內。更明白的說：鄧先生一方面強調農工中心，一方面指出了大地主大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以外的其他各階級必須結成民主聯合陣線。沒有農工中心，聯合陣線不能形成和鞏固，沒有聯合陣線，農工中心力量不能很好的發展，這是相互作用的。這正和當前全國人民要求的「聯合政府」，意義完全一致的，不過這個聯合政府的建立，必須是農工民主力量強大到可以做中心的時候才有可能。這也就說明了北伐統一陣線因為農工力量是初生的薄弱的所以要破裂；抗戰時期和當前的聯合陣線也是因為農工民主力量還不够強大，又



「一次次的破裂了。但歷史証明了，農工民主力量在一次又一次聯合陣線中繼續向前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必然可以推出一個真正的農工中心的聯合政府來的！也因為是農工中心，這個聯合政府就不會走舊民主的道路，而要向農工平民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去。

鄧先生的農工平民民主主義，就是建立農工中心的聯合政府的道路，就是農工平民民主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三）農工平民民主主義，是繼續和發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並涵合了世界革命思潮的一種結晶體。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起來，到了國民黨改組，確定了「三大政策」，才成爲一部較完整的革命理論，而鄧演達先生的農工平民民主主義，是孫先生革命理論與實踐統一的發展，使三民主義獲得更豐富和更完整的內容。就在革命的實踐上，鄧先生也完全忠實並發展了孫先生的主張和精神的；在孫先生逝世後的北伐革命高潮中，成爲聯合各黨派各階層的中心人物是鄧先生，成爲農工政策的實際執行者，團結和教育了廣大農工群衆的中心人物之一也是鄧先生。以至當時南京政府背叛革命的時候，苦撐着武漢革命聯合政府，繼續執行農工政策的也是鄧先生，甚至聯合陣線最後破裂了，全國復興革命，再成組織農工平民民主的聯合政府時也是鄧先生，而且鄧先生兩次出國，悉心研析了世界革命問題，使它所發展起來的孫中山三民主義更加科學化，並與世界最進步的思想結合起來。

鄧先生的農工平民民主主義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發展，是完成孫中山三民主義唯一的道路，一切孫先生的忠實戰友和信徒，今天應該在鄧演達的旗幟下集合起來！這就是復興中國革命，重建農工平民聯合陣線的唯一道路。

（四）農工平民民主主義的具體方案，是有現實的客觀基礎的，今天依然是我們迫切地要促其實現鄧演達先生的基本精神

（五）



鄧演達先生的基本精神

的。

1. 是平民政權，鄧先生說：「所謂平民政權就是以農工為重心的爭國同盟」。（具體的說，是包含各民主黨派和階層的）「而建立平民政權的先決條件是形成平民群眾本身的組織，最切實莫過於職業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等，其次是事業業的組織如學生會，婦女組織，兵士組織等」。鄧先生非常具體提出組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的代表比例如下：

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佔百分之六十。

其他各職業團體及事業業團體，佔百分之四十。他還主張各地方的權力機關為省民大會，縣民大會，鄉民大會。中央政權應縮小至最低限度，擴大地方自治權。組織人民的武力來保持政權。

這就是平民政權的實質，今天我們要爭取和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也要漸漸走上這條道路，那才能有和平的保障，才是真正的徹底的民主。

2. 對外政策 鄧先生力主反帝，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聯蘇，並與各民主國，各弱小民族結成親密的關係，建立反帝國主義的聯盟。

今天根據鄧先生的精神，我們必須貫徹反帝的任務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使中國陷於內戰獨裁和殖民地化的對華政策，聯合蘇聯及全世界和平國家與人民以及弱小民族來促進國際和平合作的。

3. 經濟政策，「一方面實行大產業國營產業的國營公營，以免產業資本家之自由剝削；一方面實行耕者有其田，為土地國有的過渡，以免地主的剝削和剝削。」他還主張推行合作社組織，同時允許私人企業的存在。

他的經濟政策是以解放農工為中心，特別是以「耕者有其田」來解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土地問題，這個經濟政策的道路，是農業工業化，農民工人化的道路，沒有這樣的土地改革和經濟改革中國的平民民主政權是不會有基礎的。

今天根據客觀事實說明鄧先生的經濟政策是非常正確的，那個地區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就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相反的，那個地區還是大買辦大地主支配了一切，它必然走殖民地的經濟道路，摧毀民族工業和破壞農業生產的。今天，爭取政治民主，必須同時爭取經濟民主！

鄧先生的農工平民民主主義在過去，他和他的戰友們，用他的意志和頭腦熱血的犧牲實踐過來的，而在現階段的民主運動上，更有其新鮮的現實的意義。鄧先生的基本精神與今天反對一黨專政，反對一黨「國大」，反對內戰獨裁賣國政府，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鄧先生的基本精神與今天中國人民堅持政治協商，堅持和平民主，并發動和組織廣大人民的力量，以壓迫反動集團，重建和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也是完全一致的。鄧先生的基本精神更是以政協代表各種階層的民主勢力，誰是民主運動最後決定最後的力量，誰發動無公認，投降，事實已說明了農工民平力量是決定的力量，是聯合陣綫的支柱。要縮短中國民主運動的行程，加緊農民農工平民聯合的組織力量，是如何迫切而艱鉅的任務啊！

十五年前今日鄧先生壯烈地在反動者的毒手中倒下去了！悲動過全中國的站在農工大眾中振臂前呼的巨人倒下去了！但是鄧先生的基本精神永遠不死，鄧先生的血已劃出了中國人民一條正確的大道。鄧先生的基本精神是一面輝煌的民主大旗，我們必須集結在這面大旗下作勇敢的民主進軍！

鄧演達先生傳略

(八)

## 鄧演達先生傳略

鄧永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的使命，站在廣大的勞苦的農工平民大眾的立場。革命領導者鄧演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反動的統治者所殺害而與世長辭了。在這外侮日亟，軍閥橫行，民生憔悴的今日，竟失去中國革命的唯一導師，瞻念前途，曷勝悲痛！先生領導中國革命，一生艱苦奮鬥，不避勞怨，其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得到結論，領導農工平民群眾與反動的統治者開始鬥爭，無恥的殘酷的敵人，在它挽救沒落的途徑中，竟用卑鄙的手段，殺害了中國垂危的民族生命象徵！在先生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為民族解放而犧牲，是負了責任，而他的一生革命事業，却是革命後死者的典範。他的革命任務，却待革命的後死者去完成！為着永垂後範起見，為印証中國革命的途徑，爰述先生事略如下：

### 一 革命的童年

先生諱演達，字澤生，廣東省惠陽縣人，其所居，係惠陽縣之龍頸鄉。從小便生活於農民區域中，該處社會組織殊為特別，與其他農村區域不同，就是地主與佃戶，分區而處，有所謂地主區，又有所謂佃戶區。地主與佃戶間的界限極嚴，因此地主壓迫佃戶的現狀，遂層見叠出。加以地主區的人們，豐衣足食，優遊餘裕，而佃戶區的人們則手足無足，鳩形鵠面，苦樂懸殊。先生適生是鄉，童年對於地主的橫暴與佃戶的困苦的印象甚深，遂構成先生的農民革命思想及土地革命思想的最原始的基礎。先生出世，適當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國人受二次戰敗的創傷，對於國際地位以及中國的國勢，已漸漸明瞭。且適值革命運動，活躍甚烈，革命黨人時常將中國國勢的凌夷與帝國主義的侵襲，向農村方面宣傳，先生耳濡目染，遂又種下先生民族解放思想與反抗帝國主義思想的胚胎。當時先生已獲得了革命的基礎，又因與革命運動接觸的機會極多，於是在八歲時，即參加革命實際活動。先生以年幼，常隨姚雨平輩作交通員。

往來於廣州佛山間，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經手傳達，機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黨員皆稱加稱許。因中法中日戰爭之後，先生習染於革命黨人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富國強兵的思想，所以年輕長即志在做一個有用的軍人。這就是先生學習軍事學的動機。

## 二 革命的準備時代

先生十二歲時，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為同學中最年幼者。但先生聰穎奮發，頗為師友輩所驚奇，鄧仲元先生尤器重，至日有奇字，辛亥之役，先生隨北伐軍出發，在姚雨平軍中，初露頭角。南北議和，民國建立，先生復回粵重軍事學，畢業於廣東陸軍連成學校。但當時中國政治在袁世凱的軍事統治之下，黑暗甚分，革命勢力逐漸失敗，先生感覺異常煩悶，卒於民國三年退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從事於經濟科學的研究。中間，袁氏稱帝，都以北洋軍閥的跋扈，中國政治愈加黑暗，經濟愈加破產，先生不勝憤激，擬棄其所學以從事工學，但限于家府經濟尚未果。民國五年冬預備學校畢業，升學於保定軍官學校，於研究軍事之餘，復繼續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民國八年，畢業於保定軍校，被派赴後防軍入伍學習，充下級將校，廣山鄧仲元先生召同歸到，使統率官兵，於是先生脫離學校生活而努力革命事業了。

## 三 初期的努力

孫中山先生令時煥由廣州州師回粵，關係甚佳，先生亦率領憲兵隨軍出發，及廣東恢復，鄧仲元先生成立粵軍第一師，先生即任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團結上下，羅致人才，仲元先生倚如左右手，當時先生即知陳炯明之跋扈，是終不能為革命努力的，只有努力培植第一師的基礎，便成為革命的武力，並以牽制陳軍，使不敢有異動。先生深知仲元先生之心，仲元先生亦深知先生之才，二人互相倚重，以發展第一師所担负之革命事業。不久，先生又受命組織工兵營，悉心經營，努力訓練，全營精神奮發，終成為各國營之模範，於是粵軍第一師的基礎，也就很穩固了。當時陳炯明已漸不能服從孫先生的指揮，計

于孫先生革命的發展，每多方制肘，而且漸漸暴露其軍閥割據的主張，隱然以廣東爲己有，粵軍一師，隨着鄧仲元先生與先生之措置，每左右其間，使陳炯明之陰謀屢欲發而屢止，粵軍第一師因對於革命多方維護，遂遭陳炯明之忌，陳用粵軍第一師必阻撓叛逆謀，但當時受環境的影響和私慾的支配，逆謀已有不能復已之勢，故首謀消滅粵軍第一師，而鄧仲元先生終于被刺，仲元先生被刺以後，先生悲痛痛癢知已的慘死，報仇心急，且深知革命的唯一希望在於維持第一師，因假其全力調動軍心的動搖，陳炯明終莫可如何。

#### 四 革命的護持者

孫中山先生知陳炯明終懷異志，且知先生對於護護革命，夙具決心，於是特將先生所統率的獨立營改組爲警衛軍，以警衛總統府。民國十年北伐軍已入廣西，陳炯明益覺跋扈，扣抑餉械，使北伐軍不能發展，及孫先生由韓回師，陳炯明退處東江，第一師因先生之斡旋，首先擁護孫先生北伐主張，全部出動，民國十一年北伐之役才能實現。化伐軍向北推進，第一師前鋒已過韶州，而陳炯明縱使葉舉等圍攻總統府的事變忽起。這種消息傳到前方，因不明真相，各部隊均發生動搖，第一師亦無法維持，先生乃急會同陳銘樞部第四團，由信豐退到河源。先生自己則潛赴香港轉上海，見孫先生商榷善後辦法。後陳銘樞辭去軍職，舉師於南京，先生則連合陳炯明與葉舉等形成新團結，整理軍隊，相機以圖再舉。十一年冬，孫先生機調將各團調至等處，平東下諸逐陳炯明，第一師首先響應，滇桂軍兵不血刃而佔廣州，緒第一師亦從此分化矣，先生藉不顧忌，與諸將商議結果，將軍隊重新編制，推李濟深爲師長，而先生任第三團團長，於軍中多所建樹，使第一師及其所率育之第四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不少的功績，論者每以先生努力爲多，陳炯明的幾部既被逐出廣州，仍盤踞東江一帶，而劉資賢楊希閔等羽毛已豐，則又復煽動跋扈，把持財政，劫奪糧食，無所不爲，革命局面復陷于困頓境地。孫先生用處廣州，一蹶莫展，因爲職兵悍將，早已不復知有孫大元帥，更不復知有所謂革命了。先生於此時並不畏難，益振奮鬥爭，先行想法使第一師

討黃鴻英殘部爲初等，由江門四邑遷移入西江一帶，然後協力肇輝廣西新興將黃紹周白崇禧等以革命大義，與取得相當的聯絡，於是山聲應以至梧州連成一氣，聲勢益壯，楊希閔劉震龍石生等於道縣卓絕，任勞任怨，但先生之精神與體力，不特爲同儕所佩服，亦且爲反對的敵人所欽敬了。

## 五 黃埔軍官學校的建設

孫先生當時外受陳炯明的攻擊，內受楊希閔等的挾持，感覺到非訓練革命的武力，決不能建立革命的基礎，並以消除黨內的反對，乃與先生等商辦黃埔獨立陸軍官學校，並欲使先生任訓練部主任，先生力辭，卒推李濟深居正而自爲其副。黃埔軍校開辦之後，所有人才的招致，訓練的規劃，都由先生主持其間者，鄉村小農的子弟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的複雜的政治環境——楊劉獨佔廣州的時代——與全國的混亂與訓練，構成當時黃埔學生的環境——因爲得着了這點靈魂，所以在後能和陳炯明的殘部及楊劉作戰所向無敵，發揮時代的機能，就是這個原因——這時候學生對於先生的愛戴，和先生對學生的嚴肅與慈愛，構成當時的革命中心團結。學校當局深忌先生，轉倚王伯群爲心腹，王又援引其羽翼，深相結納，隱然對先生起一種敵對形式。先生以革命的事業久受軍閥的摧殘壓迫，不能有所建樹，乃悉心經營黃埔軍校，希望造成革命的武力，以保障革命前途的發展。而此時目擊着這純粹的革命武力，又消爲當局所劫持，於是先生翻然感悟，知中國的革命事業，應從政治的解放以達到國家的建設，乃決然辭去黃埔軍校職位，而出而進赴總理政治經濟。先生出國未久，孫先生便逝世，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危險，乃不得不忍痛放棄未成的事業。於十四年冬又回國內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對於整頓革命方略多所貢獻，被選

鄧演達先生傳

爲第二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時黃伯樞任黃埔軍校教育長，百事廢弛，精神不振，學校當局乃欲把黃埔學生訓練成材，非復用先生不可，遂強邀先生回校繼任王伯樞任教育長。先生再度任教育長後，學校當局每事體結先生歡心，先生雖知其用意不誠，但竟以革命大義糾正其錯誤，每遇事直陳，不顧忌諱。聽者雖心不爲然，但終以欲用先生之才，而極力敷衍。

## 六 革命的煩悶期

劉先生離國後，某王公已逐漸鞏固其在軍政的勢力，並隨着勢力的增大而逐漸顯露其真面目。十四年秋，蔣原仲劉先生謀刺案，逐去胡漢民，把廣州政府的政權，逐漸劫持操縱，使變爲他私人的勢力。是年冬，先生回國，復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乃希望其翻然覺悟，改變其自私行爲，故悉心經營，訓練學生，王伯樞不自知其屈，因失位而深恨先生，並多方勾結收攬份子，向當局包圍以攻擊先生，當局亦以羽翼已成，雖先生力陳革命利害，每不以爲意。三月十二日之變，是試演獨裁的第一幕，但以師出無名，不得不藉名掛共，事變發生後，王伯樞圖中兩先生，挑撥猜忌，將先生調任汕頭軍校校長兼第一軍黨代表，而蔣使其他各群起反對，以威脅先生。北伐戰起，因事實上需要，強先生任粵政治部主任，以緩和革命份子對已的怨視，先生亦希望北伐軍的進展中，發民衆本身的力量，以制裁軍閥的崛起，中興的革命力量，遂較然尤諸損負諸最有意義的繁重工作。

## 七 北伐途中

在北伐開始的時候，先生對部屬說：「我們應該要明白中國的農工平民大眾，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二重束縛，我們此去是要喚起廣大的農工平民大眾自己起來解除自身的痛苦，同時我們要廢除軍閥制度，永絕中國禍亂的根源，我們更要注意並防止我們自己造成爲軍閥的傾向。」只在他這幾句話中，我們就可



以明白他意向和苦心了。北伐軍內發生智的轉變而順運地進行，就和吳佩孚的軍隊相接近，先生途中，除主持總政治部事務，使部員努力調查沿途的農民生活狀況及土地分配情形外，復發行人事參議事項，所以事務至為忙碌，常徹夜不寐，平且又復積弱前進，部員多有因精力不支而病的，但先生却精神如常。先生在旅途中，在軍事百忙中，猶不忘他畢生所念念不忘的農民問題，他組織農民生活調查團及農民問題研究會，雖在百忙中沒有具體表現，但對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努力和信念，在當時的革命軍中實為獨有之一人，吳佩孚敗後，劉玉春陳嘉謨兩軍武昌城，屢攻不下。先生任攻城司令，親臨城下指揮，槍彈如雨，吃不為動，後武昌攻下於國民軍克復，先生過漢口漢江，骨肉盡爛，其任事之艱苦卓絕有如此者！

## 八 武漢政府的組織

武漢已下，先生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理軍務，策同革命軍前進上，時北伐軍內開如倒置，被壓迫的民衆驟然失去了重壓，民衆運動勃興起來。特別是在武漢，因為當地的工商業者都有相當的基礎而經濟及政治又是以經濟長江各省，因此在此武漢的政權掩護下的民衆運動，自然可以推進並影響全國的主要地區；民衆起來的信就到了，這是以動搖軍閥的基礎，並可由民衆的力量，發展革命的事業，先生這時曾力勸當局拋棄自私的主觀，反復說明民衆解放，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希望在這一片席中，能動轉當時軍事當局的專橫，短縮革命的過程。無奈其專惡性成，且乘軍事勝利的餘威，不特輕視民衆的解放運動，更藉「過火」，「亂軍可受，黨人可殺」等言論，唆使一般舊唐老朽之徒，露骨地表現反對革命。當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依照決議遷移武漢使能領導革命，乃某公反欲留住南昌，以遂其奸謀，先生認為這是革命的危機，如果不設法制裁，則革命將一敗塗地，而且過去的努力，也完全為所利用，因此非常痛心，曾痛哭一晝夜，由南昌趕回武漢，與大品氣監委員成立中央黨部、組織武漢政府，以圖制止陰謀，而挽救革命。武漢中央黨部和政府先後成立，先生應補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並於這時向中央提議成立土地問題委員會。

會，將北伐途中所獲軍械於一地問題材料，盡數貢獻中央，又令中央農民部和經政治部工作人員合組農工問題研究會，各軍隊政治工作人員，隨時隨地組織農民問題研究會，盡量招致農民實際參加討論。使中國革命核心的農民問題，成爲國地令人注意，乃由中央農民部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訓練實際工作人員，確定革命的基礎工作。這時實力派人物已告明臨地反對革命，在南京另行成立政府，士商盡力妥協帝國主義，一面向武漢政府攻擊，而武漢政府則對於革命的大計劃則舉棋不定，時而主張討伐南京，時而主張北伐，蓋已充分表現出領導機關的無能，十六年夏天大軍出動北伐奉系軍閥。先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務部主任，督率部員隨軍出發，並親自參加強發至所部銳軍中工作，臨戰決戰，幾軍馬過半，全軍準備犧牲，先生從容不迫，往來於火線中，表示與該軍同生死，共勇敢負責，官兵無不感動。

在武漢的政壇風雨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先後的組織起來，城市中的工人及青年學生固能表現其鬥爭的威風，即在鄉村中的農民也已開始搖撼地主的政權，革命群眾的聲勢，摧毀了當時服務於政府中的文武職員，叫他們不敢再作歹，叫他們不能不日夕勤勞，人人心中都燃着憤怒的一切的粉飾，新的一切快要到來。然而在革命高潮當中，上層份子總感到不安和恐怖，當時所謂革命的領袖們一上虛偽無恥的所謂民主政治者——如汪精衛陳公博等首先動搖了，並且撒播反革命派的餘唾，痛罵民衆運動的「過火」，根本反對民衆的要求。於是先生很堅正的向這般動搖的領袖們警告，以促他們的覺悟。但是，這時錢的矛盾並非警告所能解決，而領袖們的覺悟，至多亦不能超過本身利害之一途，先生知革命之勢勢已無可挽回，遂於十六年初冬毅然跳下後湖，化裝工人，開道從西北出國。

## 九 爲民族解放而奮鬥以致犧牲

先生離國後，經莫斯科，國際共產黨開極大的歡迎會，歡迎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在會中先生將革命的性質，詳爲解釋，並指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時黨等反對派與舊派派戰鬥正烈，來及中國革命問題，先生只能自守其主張。因此先生遂秘密離開莫斯科，轉赴柏林。